

偶得集

梅九寿杂文集



目 录

带刺的梅	李炳银	(1)
“异地做官” 补		(4)
“机遇” 断想		(6)
政声人去后		(8)
“超生罚款成绩显著”的联想		(11)
钱这东西		(13)
“糊涂” 乃境界		(16)
说 “恨” 道 “毒”		(18)
酒文化发展杞忧		(20)
假如民为水		(23)
勿以善小而不为		(25)
人格琐谈		(27)
说 “民谣”		(29)

公道何“急”	(31)
预言	(33)
生财有道二题	(35)
不必事必躬亲	(37)
不知缘何“笑愚公”	(39)
说“回避”	(41)
猪向前拱 鸡朝后刨	(43)
“拾猪不拾羊”	(45)
“知识”杂谈	(48)
父子论“器”	(51)
君子和而不同	(54)
“事在人为”补	(56)
闪光的人生	(58)
说“光彩”	(60)
启而不发的启发	(62)
发·罚·法	(64)
幼教杂感二篇	(66)
说“亲”	(69)
印章·名片·信用卡	(71)
“异化”析	(73)
富了怎么办	(75)
闲话职务后的“()”	(78)
“牢骚”别议	(80)
读书话“能疑”	(82)
重使与重用	(84)
“班门弄斧”≠卖弄	(86)

“闲聊” 小议	(89)
文凭 “炎凉” 析	(91)
谈看法	(93)
“喊打” 与真打	(95)
“公”、污水及孩子	(97)
没准儿·没底儿·没本儿	(99)
话要讲到点子上	(101)
约定俗成之我见	(103)
为“赶时髦” 正名	(105)
有钱能使“官” 推磨	(109)
无原则、有办法及假如	(111)
“马上办” 与“明日来”	(115)
“和稀泥”的艺术	(117)
放权·放手·放心	(120)
说奉承	(122)
任命与招标	(125)
对传闻的正确态度	(127)
“希望” 何以代批评	(129)
交诤友	(131)
赏花与赏人	(133)
“知人” 与“知己”	(135)
谈考验	(138)
也谈杨修之死	(140)
为人莫效螃蟹	(142)
有感于诸葛亮辞贺自贬	(144)
“有分寸” 解	(146)

“同一得三”的启迪	(148)
蒲鞭岂能罚罪	(150)
代祁奚辩冤	(152)
范雎释放须贾的启示	(155)
“难得糊涂”补	(157)
研究自己	(160)
爱人的属相	(163)
看《秦琼让印》	(166)
谈理论联系实际	(168)
龙化话“龙”	(172)
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	(177)
“缺什么补什么”好	(188)

附：

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邻	尧山壁(196)
真善美的歌	杨冬葵(199)
泉流源自清	房丽君(204)
后记	(208)

带刺的梅

李炳银

朋友把梅九寿的部分杂文作品拿给我看。此前，对梅九寿毫无了解，可看了“目录”，我答应留下来细看。像《“异地做官”补》、《政声人去后》、《说“民谣”》、《说“奉承”》、《假如“民为水”》、《钱这东西》一类题目，确实是对读者有点诱惑力量的。

杂文这种体裁，虽然年轻，但因为鲁迅先生的成功运用而使其名声大振。杂文有了相对突出明显的规律、风格，应当说是自鲁迅开始的。面对尖锐复杂的社会生活矛盾，勇敢机智地进行“攻守”两方面的战斗，这也许是杂文最为明显的特点了。时常准确及时地触动社会矛盾的热点和公众的敏感神经，这是杂文最能表现自己的存在和与社会与公众关系

的方式。所以，杂文的兴盛发展，首先需要一个可以使作家自由行动，自由表示自己对社会生活见解评判的生活环境。在“文字狱”横行的日子，在只能“莺歌燕舞”、“万岁潮起”的日子里，杂文是只有去经历坎坷苦难的命运了。早年，王实味在延安说了个“还不是杂文的时代”，没想到因这句话竟然掉了脑袋。解放后，杂文的命运一直不好。一位著名杂文家曾说：没有运动不涉及杂文，没有运动中杂文不挨批，杂文作家不挨整。所以，拥有杂文写作的权利并非易得。杂文写作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风险，即是鲁迅，也是如此。

梅九寿写杂文好像也有些时间了。他是否因为写杂文也遇到过什么曲折，我也不大清楚，只是能坚持写杂文，并且写了这么多的杂文，本身就说明梅九寿是一位对生活认真执著的人。看了梅九寿的杂文，我以为他许多的文章因在立意、论述表现方面都是鲜明精到的，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丑陋之态的批判也是大胆严厉的，读之确有顺气正色之感。然而，尽管梅九寿赶上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他写杂文的障碍也少了一些，但像他这样言之有物、抨之有据的好文章，似乎较少有社会呼应与反响。这是有点让人遗憾的事。

其实，这个现象的存在，并不是梅九寿的不幸，而恰恰是社会生活的悲哀之所在。也可以说，这又是一个绝好的杂文题目。一个拒绝批评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杂文是非常敏感的。这时只要杂文略有指斥，立即就会有各方面的风刮来，对杂文加以扫荡。可是，对于一个问题成堆，矛盾如麻的社会生活环境来说，往往对于一般性的批评是持一种不太在乎的麻木态度的。老百姓中有民谣说：如今的许多事，

“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自说也要说”。我以为，梅九寿的“说”也许正巧陷入到这样个怪圈子里去了。你说“异地做官”要“补”上一些新内容。不能在这里没干好，遭老百姓痛恨，调到别的地方去照样做官，弄不好还会升上一级的现象不好。可是，多年如此，所见甚多，谁又能管得了。你说民谣里说了许多党的干部不光彩的话。可许多党的干部仍然我行我素，毫不在意，你有什么办法？“死猪不怕开水烫”，“虱子多了不怕咬”，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好了。一个不在意批评的对象对于批评是没有什么反弹的。而无反弹的现象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梅九寿的杂文。表现了他人格的正直不阿。同时也表现了他修养的多样和丰厚。他的杂文不光目光敏锐，而且富于文化品味。每论一事，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举一反三，时常给人一种知世论事的通透感。梅九寿的杂文救世之心甚切，可世之可叹息者甚多，奈何！

“异地做官”补

古人讲：“仕宦乡里出，官吏远方勤”，是主张异地做官的。可时至今日，异地做官却遇到了新问题。

先说“异地”吧，遇到的问题是“移”不得。一些干部在一个地方工作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拼凑起一套老班底，编织了一张关系网。有的真可以说达到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程度。组织上要调人来时，他会“走门子”、“找关系”千方百计阻止；要调他走时，他又会“这利弊”、“那原因”地与领导周旋。其实，本地为官或虽非本地但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弊端确实不少，而异地为官好处就太多了。

记得曾读过舒展先生写的文章《活水赞》。作者从上海交大在近三年里调出五百多人，调入四百多人和山东实行县级干部交流，使死水变活的事中，悟出了“死水滩，养昏官”、“流动带来活力，有活力才有生机”的道理。作者这

样有根有据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使我们顺理成章地看到了异地做官的好处。

再说“做官”吧，严重的问题是“易”不得。一个厂长，把厂子搞成一团糟，不是提倡异地做官嘛，地方可“易”而官却不“易”。一个干部在甲地犯了较严重的错误，“易”到乙地后，“五品州还是五品州，七品县还是七品县”，“官运”竟如此亨通。还有的干部，走一处败一处，“易”了几个单位，都搞得“鸡不是鸡，蛋不是蛋”，可“屡战屡败”并不影响“屡败屡战”的机遇。有的还越“败”官越升，权越重，越“易”职越长、衔越高。

“异地做官”究竟如何？从舒展先生《活水贊》中所持观点看，似应提倡或肯定。但我总觉得此法应完善，主要应加上惩罚性条款。比如这么两条：第一条：对异地做官“移”不动的，罢官。第二条：在甲地干砸了的，就地免职，或为面子虑，“易”于乙地必须“易”官，也就是不得继续为官，更不得加官。

“机遇”断想

机遇就是机缘、际遇，也就是机会、时机。

其实，讲究机遇并非新事物。东汉时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论衡》第一章《逢遇篇》，就专门论述这个问题。还讲了一个周代老翁不得机遇的故事：这个老翁年青时，君主“好用老”，他没能做官。“好用老”的君主驾崩后，新君主“好用武”，他是学文的，仍然做不了官，只得投笔从戎。等到武艺学精，“好用武”的君主又驾崩了，新君主却“好用少”，而他已经两鬓斑白，就更做不得官了。这位老先生虽有文韬武略，终生不得一遇，说来机遇真不咋的。

机遇是客观存在，但对人并不均等。古之文人常有生不逢时之慨叹者，说到底就是机遇不好。比如陈子昂，廿四岁举进士，名噪当时，幽人王适观其《感遇诗》，惊叹“此子必为海内文宗”。但他并未得到武则天的赏识，相反，却遭

受到一连串打击。所以，他登上幽州台，有感于燕昭王与乐毅的故事，抚今追昔，唱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支传诵千古的悲歌。

正因为每个人的机遇并非均等的，所以，既有机遇不好的，也有机遇忒好的。比如“皇帝的女儿”，在婚联上就有“不愁嫁”这种得天独厚的机遇。又如“朝内有人”的人，“好做官”就是一种特殊机遇。而一些地方至今仍存在的“领导干部的子女或在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同志，提的人数多、速度快、职务高”的现象，就是这种特殊机遇的现实表现。

应该如何看待类似特殊机遇呢？徐特立同志1940年在《送董老赴京》一诗中，有“幸勿贪机遇，图存在更生”的诗句。“勿贪”机遇，对他们来说，就是不能依赖机遇，不要有优越感。“纨绔子弟”所以“无奇男”大概就是吃了“贪”机遇的亏。连老百姓也懂得“有啥别仗啥”的道理。“图存在更生”说明，要靠自己发奋图强，树自己的形象，走自己的道路，“吃老子”、“卖牌子”、“装样子”不行。

河北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誓言》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刘书记在饭馆与熟人邂逅相遇时，那熟人很爽快地说道，不管你这个书记是走后门当的，靠老子当的，还是靠钱买的，只要你能干出成绩，群众就赞成、就拥护（大概意思）。这足可使具备某方面特殊机遇的同志深省：应珍惜这种来之容易的机遇，努力做到无愧于机遇赋予的施展才干的机遇。比如，因“朝内有人”而做了“官”的，只要肯学、实干，就能够逐步缩小才干与职务之间的差距，成为群众拥护的、名副其实的领导干部的。

政声人去后

邢台县委、县政府出版了记述张玉美同志工作实践的《春华秋实》一书，这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且非常是时候的事情。其意义不想赘述，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弘扬老一辈革命干部风范，激励年轻一代。“非常是时候”是指从时间上是恰到好处的。大家不妨想一想，玉美同志已年近古稀，和玉美同志同过事或熟悉玉美的同志多数也已50岁上下，不趁这部分同志和玉美同志的交往记忆犹新时记录其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待到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岂不悔之晚矣？相反，假如此举是在几年或十几年前，即在玉美同志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医院书记或省卫生局长等职务时也不好：一则玉美同志似有为个人“树碑立传”之嫌；二则编纂者也难脱“瓜田李下”之疑。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玉美同志过着一般离、退休干部、实际上和寻常百姓无甚差异的生

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还这么尊敬他，爱戴他，念念不忘他，足见他~~清正廉洁~~，~~政绩显赫~~。

一个领导干部在一个地方工作了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政绩究竟如何，真正的反映，不是在其车来马去、前呼后拥、大权在握时，而是在其调离、卸任甚至被贬谪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很有些这样的势利眼——你在台上他会抬你，你下了台，他会踩你。俗话说的“葱皮薄蒜皮薄，比不上人的眼皮薄”，说的就是这种人。人民艺术家赵树理在其代表作《李有才板话》中就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这样的典型，他叫张德贵，很会抬举人，奉承人，有这样一段板话写他：“张德贵真好汉，跟着恒元舌头转，恒元说个‘长’，德贵说‘不短’；恒元说个‘方’，德贵说‘不圆’；恒元说‘砂锅能捣蒜’，德贵就说‘打不烂’；恒元说‘公鸡能下蛋’，德贵就说‘亲眼见’。”《邹忌讽齐王纳谏》所记述的齐国策士邹忌用自己的事情设喻，以讽劝齐王广开言路纳谏除弊的故事也说明，“势利眼”的确称得上是国人的故疾旧病了。邹忌欲与城北徐公比美，先后问过妻、妾、客，都说徐公不及邹忌美。一天徐公来访，邹忌对着镜子认真和徐公比较，发现自己远不如徐公漂亮。邹忌有自知之明，他从妻、妾、客三人对自己不切实际的赞美中得到了启示：“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其实，领导干部也常常会遇到“私我”、“畏我”、“欲有求于我”者。“私我”者，会像“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样，看领导什么都好，甚至会“爱屋及乌”把领导的缺点也看作优点、长处。“畏我”和“欲有求于我”者，包括千方百计讨好领导者，或马屁拍得山响，

或溢美之词不绝于口，甚至玩弄“掌柜打了瓮，上下有使用，下截当马槽，上截作烟囱”的伎俩。

当然，我也听到有人说玉美同志不会办事的，说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尤其1953年2月15日在火车上那次，他如果会办事，跟主席到南方走一走、转一转，可真就有了政治资本，少说也弄个省长、部长干干。也听说有人说玉美同志傻的，把党的工作、群众的事情拴在肋条上，自己的事像记在水瓢上。结果呢？儿子当的不是官，爱人当的不是官，都是普普通通的基层干部。本人过的是清苦的日子，连一笔可观的积蓄也没有等等。由此我想到了“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诗句。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和历史上曾有讥笑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作文轻薄、却不知讥笑别人的人身名俱灭时，四杰之文仍像江河长流，永远不废一样。玉美同志虽不谙升官经，不识生财道，但他的政绩在邢台县却有口皆碑，并将像接力赛跑那样，一代代传颂下去。

“超生罚款成绩显著”的联想

据报载，河北某地“用三个多月时间，抽出1209人抓超生罚款，取得了显著成绩”。对此，笔者联想颇多。

其一，用如此长的时间，又如此兴师动众，紧紧围绕超生罚款大作文章，是牵了计生工作的牛鼻子还是抓了皮毛？假如不是抓超生罚款，而是抓计生宣传或计生措施落实，是否更有利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和生育行为的计划性呢？

其二，“超生罚款成绩显著”究竟意味着什么？窃以为，罚款成绩显著起码说明款罚得多，亦说明超生的多。如果超生越多罚款越多的恶性循环亦可褒为“成绩”，并冠以“显著”，那么，计生职能部门的地位、作用和衡量工作优劣的标准，就很使人费解——是减少人口出生率还是增加超生罚款？

其三，如果把计生工作的兴奋点引导到超生罚款上，人

们便很可能产生“有票子就可生孩子”的错觉。甚至真的形成并非危言耸听的“有钱的买着生，有权的明着生，无权无钱的偷着生”的被动局面。这对于抓“基本国策”的确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同时，我还联想到听来的一则笑话：一个被列为全国贫困县的县长在三干会上侃侃而谈：“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迈进了全国贫困县的行列……”看，这令人啼笑不得的“超生罚款成绩显著”与这则笑话，何其相似乃尔。

超生确也当罚，终究不是目的。所以，工作中或宣传上应掌握分寸即度。